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〇〇期 ——  
(二〇〇二年八月五日报)

---

本期目录 (zk0208a)

---

【文献资料】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在清华大学讲话	周恩来
【专题研究】文革中的领导与群众：话语、冲突和集体行动（二之一）	萧喜东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十七）	周孜仁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在清华大学讲话

• 周恩来 •

同志们、同学们、朋友们：

我做为一个中央的工作人员来参加你们的大会，是想老老实实的向你们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意识形态方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你们的政治立场，思想作风，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方面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方面，所以我们每一个要革命的、要继续革命的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火热的阶级斗争中，考验自己，检查自己，正是因为这样，我首先讲讲今天这个会。

中央、党中央的常委会、毛主席要我来过问一下清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接触，仓促上阵，搞不好也要象工作组一样，也要撤走的，在开会当中，二十九日决定的，三十日就找工作组和同学们谈话，讨论分析看文件，看大字报草稿，到现在只有六天，我对清华的情况当然是一无所知的。可是对工作组的方向摸了一下，我同意李雪峰同志说的，我们派工作组犯了方

向的严重错误。这就在客观上给各校的工作组一个根本性的困难，因为当时各学校对前北京市委领导的各学校的党政领导机构不信任，对于现在党中央指定的新市委，搞敲锣打鼓表示欢迎，要求党中央和新市委给各校派工作组，我们是仓促决定、仓促上阵，仓促派了工作组，没有仔细考虑工作组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没有很好的交待工作组的根本任务是什么，甚至党的政策也没有交待。整个北京市派到各校各单位的工作组将近一万人，从各地各战线各部门、全国调来，也没有经过学习讨论，又没有详细的交代过政策，交待任务，这给工作组本身一个很大困难，还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包办代替的办法，不发动群众，不走群众路线，与大家商量，即使是很好的工作组也是很难做出很大的成绩，只要把方向引错了，就不能在学校里完成毛主席指示的三大任务，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教学方法。不把全校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的力量集中起来，向这个主攻方向战斗，而转过来在学生中群众中找岔子找毛病，或者发现问题，引导一部份学生斗另外一部份不同意见的同学，这当然就走到犯严重错误的方向上去了。我们今天这个会场上的表现正好说明这个问题，有同学递条子上来问，今天这个会的布置是不是有很大的阴谋，我向你们回答，我是过问这个事的，没有阴谋。但是客观情况反映了是互相对立，争论不休，还是把过去工作组引导错误的结果表现出来了。我在七天以前到另外一个学校去，那个第二外国语学校的工作组犯了更严重的错误，批判了同学，双方对立争吵的更是解不开，工作组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去，当场似乎说服了大家，彼此都以真正的方向错了，但相互争吵两三周了，同学的隔阂很深很深了。隔阂很深眼红了，我走了后，他们还继续吵。我劝他们把矛头对准学校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在学校中打架破坏同志间的关系，在主席的斗批改方针下，由团结的愿望出发，互相帮助达到新的团结，建立同志关系，但是一个星期后，一个宿舍里，还是不说话，在饭厅里瞪着眼。我可以推测到清华今天的大会，是客观的反映事实存在的。我们台上有很多同志也不满意这种现象，如果错了，那么我来第一次犯的错误，有不同意见，当然排名次可能有错误，但是我没有这个意思，对蒯大富案件和刘泉案件，我是主张解放和平反的，对蒯大富和刘泉抱反对态度的同志，我说服过他们，他们坚持要讲，讲一讲也好，听一听。今天全国各地来参观的人很多，听听么，看看理由站住站不住，该不该改正。但不管怎样，总会证明工作组，根据北京市委在人大会议召开的大会上中央同志讲的，主攻方向错了，不但是清华，好多工作组的方向都错了。即使初期客观上有必要派工作组，也应很快发现工作组客观上阻碍了运动的发展。各校的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各校的师生员工自己当家作主，依靠群众闹革命，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因此，我们应当把责任引到自己的身上，我们检讨，工作组应当检查，而不应当把责任推到下面同学、教职员工、文革领导同志的身上去。

现在我来讲一讲我们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战士，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不应当隐讳这个错误，也不应当允许这种错误，我们大家知道，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人，依靠人民才能把革命搞成功，中国革命的历史是如此，世界革命的历史也是如此。我们过去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这样，解放后十几年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基本路线也是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宪法中规定，允许人民有出版、结社、集会、言论、游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宪法制定以后进一步对我们说，为了纠正领导上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错误，革命人民要有请愿、罢工、罢课、罢市的自由，我们要不断革命，领导上有错误要允许人民公开批判，大字报、小字报、大辩论、小辩论，大鸣大放，都是很好的形式，是比较文明的，我们不怕乱，刚才清华中学三位同学说的对，就是需要敢于在需要的时候，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革命群众要有革命的造反精神。革命群众有造反派，刚才清华中学红卫兵三论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起了带头和创造的作用。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起了号角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老实说我应当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毛主席看了两论造反精神万岁很称赞你们的革命勇气，革命的造反精神和首创精神，他们以大无畏精神，把矛头对准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阻碍运动的工作组，有什么不可以呀！如果工作组阻碍运动的发展，如果压制群众运动、甚至进行镇压，那就有权利把他们赶走。学生是革命学生运动的主人，很清楚要依靠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职工。工作组来校后如果起一个暂时的作用还可以，

我们在工作组夺权后又加了一些限制，生怕出乱子，这是旧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祟作怪，正如毛主席常常批评的那样，前怕狼后怕虎，对群众运动不是热情支持而是泼冷水，限制这限制那，一句话，就是怕乱，怕字当头，怕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维护的那种修正主义的秩序搞垮。只有破这个旧秩序，才能建立新秩序，怕乱是资产阶级思想，是想维持旧秩序，是想维持作官当老爷的旧秩序，不是我们需要的革命秩序（掌声）。我们在这里应当说凡是过去中央的指示或北京新市委规定中有阻碍文化革命的，今天我们应当重新审查，凡是不符合主席思想毛主席指示的都应当废除（掌声）。应当承认在北京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同志是有错误的。我在这里说了一点，你们就懂得了，所以说对学校派工作组不是好办法，因为客观上阻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他只是代替旧的党的领导，依然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灌输的办法，而不是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动起来以后做帮手。有些地方慢慢想出来了，但是我们想的较晚，直到毛主席亲自抓这个问题，才认识到工作组应当撤回。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年青的一代，特别是大、中学校中的革命学生，教职员有机会起来自己革命，当家作主。其实中国学生运动的传统，远的不说，清朝末年，就是在北洋军阀时，四十七年前的五四运动和三十年前的一二九运动不是都出在北京吗？不是在大学学生中进行的吗？那时，我们在主席台上的，都是这两代学生。我们那时幼稚的很，比起你们来幼稚的很，那时我们敢于自己起来闹革命，为什么在今天，在毛泽东的时代，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专政下，我们反而不相信你们这一代呢？这不是对你们信任不够吗？这不是对形势估计错误吗？对工作组估计过高吗？现在这样做是使你们更有信心，搞好运动更有信心，打破这个局面。

不错，清华在蒋南翔的领导下，变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清华园，但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你们两万革命师生员工团结起来，齐心进行斗批改三大革命，我们有信心，清华的革命志气会比现在更高起来。革命矛头不会象现在这种情况，互相对立，互相不信任。据我所知，在一班不说话，在一宿舍里不说话，今天在会上发言的两派都是一个班的，证明过去工作组处理这件事做错了，做为反革命案件就更错了。同学内部有问题可以自由争论，这是内部问题，不应把二十三天的时间（有的系、单位还用了二十四、二十五天），这么长的工夫，在同学中挑起这么大的对立，把同学内部问题，引向敌我矛盾，甚至限制自由，围攻、监视、压制、盘问、轮着斗争，甚至按手印造成绝食，这领导上应当负主要责任，我相信这个扣子解得开，我找两方面的同学长谈过，还没有把这个问题说透，这台上才有这个反映，所以我在会上还要讲。党中央毛主席派我来清华做一点解释工作，我想这件事我不做好，我不回去。

当然，我刚才说的上面要负责任，没向工作组交待好任务、政策，工作组没搞好以至造成工作组的错误。应当考虑工作组的撤回问题。因而造成了在北京市几乎没有例外的一部份同学斗有不同意见的另一部份同学，这显然是方向的严重错误，具体问题，各个学校的工作组有自己的责任，比如清华蒯大富同志问题，刘泉同志问题，及各系扩大了被围攻被斗争同学的问题，工作组要负责任，叶林同志（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编者）更要负主要责任，叶林同志应当向大家赔礼道歉，我也应当向大家，向受了委屈、受了不平等待遇的同学赔礼道歉。刚才说的事情应当结束了。应当结束这种争论、这种对立了。当然我不是说原则问题可以不争论，而是说同学们之间的敌对的互相攻击，这样的情况应改变。要把主要矛头指向黑帮，同学们互相争论的情况应当结束。

叶林同志的检查，只是初步的，同学们对他的检查不满意，有意见，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开这样的辩论会，进行批评，而对今天已经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再争论了。清华要把主要矛头指向斗批改方向上去，要实现三大任务，首先要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批评，进行辩论，要把工作组的问题辩论清楚，我想是必要的。应当说工作组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的，老革命，是要为清华文化大革命效力的，但是老革命，好心肠，没有做好事，不能怪他们，我们上面要负责任，今天会开完了，我要给他们彻底说说，要更好的更彻底的接受你们的批评，不背包袱要轻松愉快，诚诚恳恳的接受同学们的批评。总的方面，责任要由领导小组负，叶林同志负更主要责任，

如果各系各年级各班要对各系各年级各班工作组批评，也可以开小会进行，如果那一部份讨论完了，得出了一个团结的结论，就可离开。来的时候也不是浩浩荡荡一起来的，而是分批来的，也可以分批回去。但是有新问题要他们回来我看他们会高兴回来，只要他们是老革命，是彻底革命者，一定会诚恳接受批评，愿意改正。但是在这里，我要对工作组说几句话，你们留在这个学校的时候，在班里在食堂里，还要和同学接触，可是你们不要和过去一样，向同学宣传与中央、市委和叶林同志不同的意见，否则，这样宣布，回到班上，宿舍又嘀嘀咕咕起来，下一次又这样。这一点应当向工作组很郑重的要求这样做。对于工作组，只有叶林同志代表检查，如果要求其他同志讲话，以后会有机会满足你们的要求。或者登台讲话，或者书面发言。

刚才说过，这些错误，必须也只能由工作组上级来负。对于系的、校的本身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同学们，他们是不能负责任的，因为他们是被指定的，选派的在工作组的决定下办事的。任何一个同学不能独立思考自觉地进行工作。刚才最后一个同学发言，他们虽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可是在这样工作组指导下，就变得被动了，因为他们相信党、相信同学、相信工作组按政策办事，可以不怀疑，考虑的时间也没有，据我了解，一般同学每天两小时是保证的，但是他们只能等到这个时间，十二点半、一点半，才能挤出一点时间来学习，这是实际情况，这必须对负责实际工作的同志们同学们，一方面对他们进行善意的批评，另方面对他们以应有的谅解，这样才能团结。

我们应当说，清华的同学们，教职员们是要革命的，要革命的就在这次大革命中经受锻炼，来考验，谁经得起考验，谁经得起斗争的锻炼，要在这半年的斗争中进行，谁是左谁是右谁是中不能由上面说，谁是好汉只能由自己在斗争中才能说明。大中学校的同学都二十岁左右，不可能不犯错误，只要不是执迷不悟的，允许犯错误，列宁这样说过，毛主席这样说过。当然犯错误就要改，而且还要多次的改。我们是青年来的，我们青年时更幼稚，犯了更多的错误，只要革命，下决心改，只要跟着毛主席闹革命，跟得紧、改得紧，有错就改嘛。紧跟毛主席，跟得不紧再改正，再跟紧么，跟了四、五十年，我们就是这样互相勉励，我们要作毛主席的好战士，好战友，我们要保持晚节。我们老革命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也犯过大错误，我们党最老的同志，和毛主席一起创立党的董（必武）老可以作证。他在五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从旧社会来的，我们对新事物，脱口而出，猛然一想说话常常是错误的。要按照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才能比较的接近，比较的完全。八十岁的四十五年党龄的同志都这样说，我比董老小十二岁，我要向董老学习，难道你们年青人就不会犯错误吗？你们读毛主席的书我相信比我们读的熟。常常是你抓这一句我抓那一句吵了起来，这难道就没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吗？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几个劳动家庭出身好的青年谈过话，他们客观的分析，即使出身劳动家庭，从他们父、母身上也看到有旧思想旧习惯，甚至有剥削阶级的影响。我是常把我的封建家庭拿来解剖的，今天不能讲长，但我总要给你们讲一讲的。

你们问为什么不把蒋南翔拉回来斗，因为今天针对工作组的错误，这个问题做好了，就可以集中力量打黑帮。

有同学递条子问，说你们组织了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问对不对，上午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说党在学校中的政策不是这样的。我相信你们有一定的考虑。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相信你们更会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你们这样才能按党的要求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这个政策在清华里同样不例外。因为清华里同样是广大青年学生，而且有大量的工人，加在一起全靠你们一起来实现斗批改的三大任务。

有的同学递条子问，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的录音，录音在复制，会给你们放的，一定会给你们放。

今天只能回答这些问题，希望今后大会中会小会结合起来开。

现在的临时筹委会，不是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但是清华园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你们认为可以，那么暂时做几天。清华这么大，二万多人的事情，还有外国人的事情得有人做。应当信任他们，考验他们。

我们这次来清华园是老老实实来当学生，来学习的。可以说我是来煽风点火，是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蒋南翔一小撮把清华搞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提倡旧清华传统。现在，清华园解放了，你们当家作主了！从今天起可以说，清华大学新生了！我愿意同你们一起在清华园里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炬，来进行斗批改的三大任务。同时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任务。

让我们高呼：新清华的革命精神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 唐郎提供

~~~~~

#### 【专题研究】

#### 文革中的领导与群众：话语、冲突和集体行动（二之一）

• 萧喜东 •

象法国大革命这样重大、复杂的历史事件，解释上的斗争一直继续着。争论有时会带着很大的情绪性。比如法国十九世纪史学家、文学评论家依波利特·泰纳，及其著作《当代法国的起源》（是一部未完成著作，共六卷，第二、三、四卷是1789—1799年的法国革命史）。泰纳的法国革命史的最大特点，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更关心革命的“病理学”，是为了诊断病源，防止革命狂热病的重演。泰纳的法国革命史洋溢着作者的激动、恐惧和愤怒情绪，而史料趋向于戏剧化的场面和人物描写，选择性地记载或遗漏有关背景，以及连篇累牍的轶闻罗列，因而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各种革命活动家被描写成病态的、疯狂的人，而下层群众则更是一群兽性、噬血的野蛮暴徒。泰纳将革命“浩劫”的原因归结为法国的国民性——一种全民受催眠的症状，导致不可避免的宿命结果。因而，泰纳所记述的历史，经常把关键性的不同派别、不同时期模糊、混淆起来；本来法国革命过程中各种人物角色、不同时期的各次起义、暴动，都有着很不相同的背景和意义，但在泰纳那里，都是一样的疯狂，一样的病态，都因为受理性启蒙思想的魔力驱使而变成野兽。

和泰纳的这种国民性、文化心理解释相反的，是所谓“社会解释”，而这主要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分析与阶级斗争学说解释法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学者看到的不是“集体疯狂”，而是历史上的阶级集团之间，为各自的利益而展开较量，“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具体说，就是法国资产阶级从出生到壮大，挑战并粉碎贵族、宗教等级和旧制度，最后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新法律制度。然而，有人也指出社会解释的不足之处，比如对社会解释的代表人物饶勒斯（著有《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史》），批评他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把革命的进展过程描述得过分平滑，似乎资产阶级在经济、文化和法律领域取得一步步胜利如同按部就班，而忽视了革命各阶段的曲折，及其暴力特性。（1）更有人批评：社会解释越来越注重初始结构和最终结局这两个变量，而忽视革命的中间过程，使有关研究越来越集中到革命前的旧制度和革命结束很多年之后的社会后果，而大革命时期丰富多彩的人物、事件反而被视为无足轻

重了。此外，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强烈批判，还来自象沃勒斯坦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的学者。（2）

历史是一面镜子。这意味着：历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也和当代社会的运动变迁紧密相关。自六十年代以来，“新社会史”、“来自下层的历史”在西方历史界兴起，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也出现了“走向下层”的运动：历来被史料和分析所忽略的所谓“小人物”（menu peuple），或下层人民，第一次受到重视；革命中的群众，不再是只被当成抽象、苍白的概念（比如“噬血的暴徒”或“资产阶级的盟友”），而是呈现出有血有肉的、有着各自的身份认同和独立的政治愿望的社会群像。比如索布尔对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无套裤汉的研究，鲁德对参与集体行动的人群的研究，都细致地记录了社会下层的三教九流，如行会师傅、帮工、短工、妇女、小生意人等在不同场合下的行为动机、行动方式和参与程度，从而说明：下层人民虽然吸收了中间等级和革命领袖的最新政治观念，但他们不是被动的工具，而是有各自的冤屈和诉求，更不是象泰纳所描写的那样，是一群没有自我意识的乌合之众或社会渣滓。另一个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忽视、被泰纳所曲解的方面，是意识活动和革命政治的关系，这也成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3）

如果说，以上对法国革命史研究的回顾，使我们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今天所处的蒙昧落后状态有所感触，那么，本文就是试图从有关经验中吸取灵感和方法，运用到对文革的考察中去；更重要的，是希望破除对文革史解释权的垄断，在这个领域发扬民主，反对一言堂专制。具体说，我将采取的研究策略是：一、避免主流和流行文字中所特有的烘托渲染气氛的手法，即象美国“新历史”提倡者罗宾逊所批评的那种追求“画面生动的、阴森可怖的、奇闻轶事的”史学，（4）而是力图通过辨别分析来提出真问题；二、注重区分不同人物、不同派别、不同时期，对主流文字出于某种目的有意模糊混淆这方面的信息所造成的混乱，加以澄清，辩明事件的是非曲直。三、注重主观意识、话语活动与行为之间的联系，这样做时，摒弃把文化作为整体性的民族心理决定因素的旧文化研究方法，而采取视语言符号为斗争场所的新文化研究方法；（5）四、把关注的目光从精英、高层和国家机构那里，移到基层群众和广场、街道上来，这一点是最主要的。

显然，这不是容易的事，笔者希望能在系列的文章中逐渐展示说明这个努力方向。作为系列之一的本文，将探讨从1966年8月“十六条”公布到10月《红旗》杂志第十三期“批判资反路线”社论发表之间这个重要阶段。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讲述的，不是现今流传的众多文革故事中的又一个故事。笔者所力图逼近的，是下层群众所亲自参与和逐渐理解的文革运动，是最大多数人当时所感受的、在今天被遗忘并被歪曲了的文革经历，而这种经历的全体构成文革的“自然史”。由于材料的不足，以及篇幅的限制，笔者的努力只能算是朝这个方向迈一小步。但笔者确信：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和体验构成文革运动的主流和本质，这个主流和本质，是共同的、唯一的，可以通过真正来自群众角度的史料和分析的积累加以言传和再现。

#### ◇ 话语转变：十六条与群众大民主

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一些重要文献，如西哀耶斯的《第三等级是什么？》、《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93年宪法等，不仅是革命的重大阶段标志，而且是纲领和意义的高度凝聚。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也产生了类似的文献。今天，一般都把《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的纲领性文件，然而，讽刺的是，这篇文件，是到1967年5月，即文革运动已经开展了近一年之后才公布于众的，在此之前，并不为参与运动的亿万群众所广泛知晓和引述。过份强调《五·一六通知》的意义，意味着完全从上层精英的角度出发看待和研究文革。“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而今天几乎不被人们提起的另一份文件，其重大作用和意义，实际上是超乎前两者之上，这就是“十六条”，即1966年8月8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全文见本刊zk9608a——编者）。这篇

可以说是具有“文化大革命宪法”地位的文献，在今天谈论和研究文革的文字中几乎不被提及，这与今天对文革的主流叙述中对群众的贬低和漠视是紧密相关的。

这个文件是在毛泽东主持下拟定的，陈伯达、王力等人七月初就开始起草，改了二十几稿，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讨论通过后公布于众。之所以说它是一部“文化大革命宪法”，就是因为在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间的群众运动中，它实际上被当作是开展运动和实行群众大民主的指南。中国现代史并不曾有过一个以重视法典条文为特征的“宪法政治”时期。对很多人来说也许难以理解的是：恰恰是在文革群众运动期间，人们的政治话语和实践最接近一种“宪法政治”，即以一个公开的条文文本为最高依据。这个最高文本，就是“十六条”。贯彻执行“十六条”、是否符合“十六条”成为人们时刻警觉、时刻挂在嘴边的一个口头禅，尽管违反“十六条”的行为屡见不鲜，人们的确是普遍地以条文的规定来判断是非、来指控对手的。

从法律意义上看，这个文本本身是很粗糙、模糊的，很容易作不同解释。它毋宁说是提出了一种法律的精神，和开展运动的路线，按照1966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十六条“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从这个角度说，“十六条”是结束刘少奇和工作组版本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毛泽东和群众版本的文化大革命的阶段标志，也是高度凝聚了文革运动所特有的群众大民主的纲领和意义的文本。

“十六条”中法律性最强、最具创新意义也最受群众欢迎的一条，是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一条的全文是：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这实际上是对广大群众赋予“豁免权利”，使他们能放心大胆、打消顾虑向领导提意见。这和《五·一六通知》形成强烈的对比：《通知》的主旨是指控“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而这些修饰词，到了各级党委领导人那里，就马上可能成为吓人的帽子，用来整人，用来迫害群众。而“十六条”恰恰是旨在剥夺当权者这种矛头向下、镇压群众的滥用权力的能力。

“十六条”和《五·一六通知》形成强烈反差的另一条，是第六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它提出：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的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还特地补充：“即使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样，运动的目标、斗争的对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这是一种含混不清的变化：运动的侧重点，从斗争“黑帮”、党外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以及矛头向下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转变成矛头对准上层、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增加了全新的内容，那就是群众自己组织自己的民主实践，巴黎公社改天换地的激进想象被唤起，暗示着领导与群众关系上的一场根本性、制度性的大变革，一次全社会的政治权力再分配的大变动。

然而，“十六条”所包含的这种话语转变，又是含混的、局限的，带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斗、批、改”中的斗，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带有重大的政治、法律意义的权力变动，但是实现这种变动的法律根据和程序却是含混不清的，具体说，就是各级领导人中“到底谁可以怀疑”、如何判断“谁是走资派”的问题。本来文革发动者设想的一个触及灵魂的、改造内心世界的运动，一下子面对着一个准法律性质的技术问题。面对学生和群众的纷纷提问，担任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给出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除了党中央毛主席不能反对，还有我们的林彪同志”，其他“我们这些人都是可以反对。”〔6〕显然这是在一种尴尬、荒谬的情形下所能给出的一个尴尬、荒谬的回答。

这个群众运动与现存权力秩序直接冲突的尴尬难局，其真正根源，还来自于“阶级斗争”话语和“大民主”话语之间的矛盾紧张：至此为止，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解、阐释和实施，都是照搬夺取政权以前所确立起来的、以经济地位、暴力强迫为基础的理论 and 实践体系，比如：出身成份、“党的阶级政策”等等，而不是把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的“阶级斗争”，作为一种全新的、迥异的范畴，对于“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毛泽东分别在一九五七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次年的武昌会议上提出这两个概念）如何展开斗争，更没有了解到其特殊的、不同于经典意义下的“阶级斗争”的有关规则。然而另一方面，发扬新中国“大鸣大放”传统的“十六条”，其意义不下于提倡一种全新的公民文化和参与政治。文革中群众大民主的具体鲜活的实践，时刻提出那些和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空间有关的规则问题，比如辩论的规则，结社的规则，筹备选举的规则，少数多数的关系，传媒（如学校广播站）的控制权问题，等等。

陶铸八月二十一日凌晨在中国人民大学有关郭影秋（曾任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编者）问题的辩论上的一段讲话，很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大民主这种新型的公民政治的规则的思考 and 摸索：“绝不能因某张大字报讲的郭影秋是革命左派，我们就说他是保皇党，也不能说反对郭影秋的讲他是黑帮的就是反革命，这个不对。他认为是革命左派，可以嘛，他有他的看法嘛！另一方面，也有同志讲郭影秋是黑帮，也不要讲人家反对郭影秋，说郭影秋是黑帮，他就是反革命，这样人家就不能提意见了嘛！”这段话还反映出：既在话语上也在实践上，传统的“阶级斗争”和群众大民主的冲突矛盾。在这期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和“武斗只能触及皮肤，文斗才能触及灵魂”都被频繁地引用。前者是指传统意义的阶级斗争，后者是指特殊意义的阶级斗争——思想斗争，而思想斗争本应采取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形式，即民主辩论。然而，在整个文革过程中，两种话语、两种实践的区别从未被明确，其矛盾冲突也就从未得到解决，为大民主实践的失败埋下了伏笔。〔7〕



#### ◇ 工作组影响的延续：以北京两所中学为例

历史上有影响的大革命事件，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会呈现出如此强烈的反差，以至人们的体验、回忆、所赋予的意义，会有天壤之别。典型的对比例子就是：一七八九年夏天，在法国首都发生的、作为理性和启蒙思想史上重大事件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发表，和与此同时法国农村地区的“大恐慌”。同样，比较文革运动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比较北京和外地，比较中学和大学，比较学校和其他单位，这类巨大反差也比比皆是。而“十六条”所体现的赋权给群众的话语，和“十六条”发表时基层群众普遍受压的现象，就是主要的一例。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到八月初，在北京高校，工作组撤销了，党委当权派失控了，然而在绝大多数中小学、国家机关和文化单位，“五十天”仍在延长，工作组、党委对群众的镇压迫害还在持续。七月间，刘少奇亲自指示，北京市中学要按照四清的模式搞“集训”：“中学太多，太分散了，不抽出来（指集训）没法讲通道理。”并指导起草了《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1966年7月14日送审稿）。因此直到七月底、八月初，当北京高校已经开始批判工作组的“五十天”，中学却还在搞刘少奇的集训。下面以北京五十五中和北京五十二中的调查报告为例说明，这两个案例的叙述都要从“五十天”开始。

六月初开始，北京五十五中师生员工贴出了许多揭发校党支部书记张X的大字报，但张X认为这是“那一堆人想夺领导权”、“歪风邪气占了上风”、“有人别有用心”等等。六月九日，一些师生支持女四中同学在该校广播女一中同学写给毛主席的信件（后来发表在6月18日《人民日报》上），遭到张X的极力反对，横加阻止，因而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纷纷起来质问校领导，张X便匆匆忙忙从团中央请来了临时工作组，宣称这是“闹事”、“反革命事件”、“匈牙利事件”。六月十日，正式的工作组连夜进校。进校后的几天内，张X和工作组接连进行了三次秘密会谈，张X给工作组介绍了给她贴大字报提意见的近十位教师，认为“他们要煽动群众”、“打垮领导”，“形成集团对运动唱对台戏”等等。张X还对该校教职工队伍作了介绍，全校教职工119人，按照张的介绍，其中56人有所谓“出身问题”“历史问题”“爱人问题”（爱人有问题）、“政治野心”等等。工作组在进校后短短的几天内，在张X的配合下，就对这个学校作了如下结论：“五十五中是领导核心薄弱，教职工队伍不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校风校纪很坏，流氓很多的流氓学校。”并且对教职工进行了如下排队：11人是依靠对象（包括支部书记张X），占12%，31人是团结对象，占25%，属于被孤立打击之列达77人，占63%。有四个教研组被列为孤立打击对象的高达82人以上。工作组推行运动的手法包括：扭转斗争目标：六月十四日工作组在全体师生面前推荐经过他们精心挑选的四份“优秀大字报”，其中三份都是揭发教师的（其余一份是揭发教学问题的），而且着重宣读的两份正是“揭发”敢于给校领导提意见的教师焦XX的。外出四清回校的党员干部黄X（教导主任）刚贴出支持革命师生的大字报，就遭到了张X等人的孤立和打击，经过工作组的默许，对他进行了有计划的围攻。对广大师生进行监视、盯梢。工作组把教师整天关在屋子里学习，一言一行都会被记录然后向工作组汇报，工作组还派了他们的“机智灵活的小侦察员”处处对教师乃至同学跟踪盯梢。教师之间人人自危，互相怀疑。有一段时间搞所谓“集训”，把教职员百分之百地赶上“楼”，人人“洗澡”、“下楼”“放包袱”，人人检查，互相揭发，命令教师集体住校，集中在一个地方，不许回家，制造恐怖气氛。然而恐怖的高潮却是在工作组撤走之后。七月二十九日凌晨在工作组尚未宣布要撤离时，张X预先得知消息，于是马上吩咐一些党员迅速回校占领书记室、校长室、党支部、团委会、校文革办公室、会议室、政治部等战略要地。并且从工作组那里接过并打开抄录了整群众的材料。接着，连续三天召开四次党支部扩大会议，部署大规模的“揪牛鬼蛇神”。八月三日，在给工作组提意见会上，借教师王XX给工作组提意见的时机，把几天前支部扩大会议上确定的第一号“牛鬼蛇神”王XX和第二号“牛鬼蛇神”左X（都是对党支部、工作组提意见最尖锐的教师）揪上了台，进行斗争。八月四日，张X迫不及待地召开了全体党员的“火线会议”，要求党员站在运动的前面，积极行动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由校文革出

面召集全体师生继续斗王、左。初三某班一同学按照支部会的预先策划和部署，三分钟之内一口气又揪出了早已确定好的十个“黑帮”，并挂了牌。一些保党支部的积极分子还大喊：“数学组还有”“语文组还有”……自这以后，对这些被打成“黑帮”的群众，采取大会斗、小会批，并以抄家、武斗、拘留、劳改、谩骂、围攻，歪曲出身、历史，大刮档案风等等手段，进行人身攻击和政治迫害。（8）

下一个案例是有关北京五十二中的一位语文老师郑兆南的悲剧经历。六月六日，郑兆南第一个站出来给学校当权派贴了题为《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一天之内，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形成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局面。”到六月十六日，学校部分学生为了冲破学校领导的压制，和当权派展开斗争，过程中发生了武斗的现象，被称为“六·一六”事件。事件发生后第二天，崇文区中学工作队队长、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李淑静到了学校，给师生做了一个报告，认为：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事件，是革命的行动，但打人是不可取的。可是没过几天，李淑静突然推翻了自己的分析，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把“六·一六”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而且硬把与“六·一六”事件无关的几位老师说成是这个事件的阴谋策划者，并把郑兆南说成是首恶分子，是后台老板。李淑静提出了“谁反击假左派最坚决，就依靠谁”的口号，谁反击“假左派”最坚决呢？就是以政治教师王文俭为代表的保校党委势力，工作组就把他们捧成革命派，把革委会的领导权交给他们。以下直接转引郑兆南的丈夫唐夕阳的控诉：

到八月底，少数暴徒在个别保皇分子的唆使下，对郑兆南同志施加了各种惨不忍闻的刑罚，让她在脖子上挂垃圾箱、天天游街，让她戴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着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后面跟着一个暴徒，扬着鞭子，象赶牲口一样的不停地抽打；有时候让她跪在地上爬，有时候让她自己打自己，还要喊着：“我自作自受”。在最热的日子，架着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间，薰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里的脏水……同志们，我没法把这些罪行全部对你们说，特别是在抄毁我们的家以后，八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一连三天不分白天黑夜的重打，更严重的是当着她的面打死一个地主婆给她看，说：“你在二十六日晚上要是有一点不老实，就这样。”肉体上的这么还不够，又施加精神上的折磨，对她说：“你女儿唐桦已经跳河死了。”郑兆南同志听到这话以后，精神很紧张，而且感到自己实在活不下去了，所以当第二天暴徒和受蒙蔽的群众抓她游街时，她就往汽车底下跑，结果没有死成，反倒招来了一阵致命的毒打，暴徒们喊：“你不想死吗，我们打死你！”打昏了，用凉水泼过来再打。……而革委会的负责人却站在一旁说：“对这样的敌人就是要狠！”同志们，郑兆南同志到底受了多少折磨，特别是在深更半夜，她到底经历了多少种刑罚，她自己没有说，我现在也不十分清楚；我也不敢去打听。

郑兆南被关押了四十多天，直到她被折磨成奄奄一息，才被学校放回家。在她死亡前的最后几天，她还在听丈夫念《红旗》、《人民日报》的社论和群众的大字报，并给党写了两封信。（9）（遇罗克对“郑兆南事件”的调查见本刊 z k 9 9 0 2 c——编者）

也许有必要明确一下上述案例的前后语境和背景：这是在造反派群众经历了种种歧视、围攻、打击和迫害，克服了重重困难（尽管他们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之后，才整理出来并公布于众的控诉材料。如果这种控诉和今天的伤痕文学（虚构的与非虚构的）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么，不应忘记：它指控的对象，是刘邓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工作组及其整套“官办政治运动”的路线和影响，而不是毛泽东或他的追随者。恰恰是“十六条”所推动的权力向群众的倾斜，恰恰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恰恰是因为有对刘邓的批判（不管这些批判本身存在多少谬误），才使得这些骇人听闻的迫害案例公布于光天化日之下，受侮辱、受损害的人才得以伸张自己的尊严和权利。换句话说，反迫害、平冤案，这些不是外在于文革群众运动的东西，而恰恰是文革群众运动的一个关键内容；在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正是这些被压迫、被迫害的造反派的盟友。（10）

## ◇ 北京高校：派别分裂，人身迫害与集体行动

“十六条”提出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群众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具体方式，并规定其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时大专院校撤销工作组、而原党委领导也已失控的情形下，已经开始了一些群众实践的加以合法化。然而其意义在于：从过去的家长制自上而下的领导向群众直接民主的一次飞跃。而且在“十六条”当时的设想中，“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在高校，这个实践被比喻为由“工作组当保姆”到“自己革命”。陈伯达七月二十七日在北师大的讲话中说：“你们现在不要搞保姆了，这么大了，保姆又不好。”陈伯达七月二十六日在北大、第二天在北师大分别建议通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来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为了保证投票前的充份酝酿和讨论，就必然要求有一个临时委员会或筹办委员会的过渡期间。

根据八月二日关锋在国务院接待室回答群众问题时的讲话，成立临时委员会的作法最初是从北京广播学院来的，关锋说：七月下旬，“批评了工作组，解放了被斗的同学，解放了上当的同学，以后他们酝酿，认为正式选举还不到时候，成立临时筹委会，负责成立正式委员会。”“两派选举怎么办？……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是：若有派，少数派也有相当的人，我们建议最好也有他们参加，这样革委会才能听到各方面的意见。”

然而，长期的家长制自上而下的领导所造成的矛盾积累、工作组“五十天”所造成的隔阂分裂，在一个短期过渡时期很难摆平，何况许多学校的筹委会、临委会是在工作组撤走之前，由工作组扶植、组织起来的。

据《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记载，“工作组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魂犹在，不过采取了种种新形式。”工作组从前门出去，北京新市委派出的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顾问就从后门进来，控制运动。新市委利用群众“多数”还受蒙蔽的“有利时机”，限令各校三天之内选出文革，“他们违背巴黎公社原则，不顾少数派的反对，暗中操纵，预先指定，成立了御用的‘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等等，夺取了各学校、机关单位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这些文革会主张“立即转入斗黑帮”，以“斗批改”的口号来压制少数派批判工作组。原来受压制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并未得到解放，依然被文革会视为“痞子”。“而原来被工作组利用、欺骗的群众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有的还当上了各级文革的头头，在干部问题上他们继续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刘邓路线。各大专院校还刮起了大办劳改队的歪风。”“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一个要革，一个要保，两派斗争激烈发展。各派政治势力各以自己本来的面目登台表演。”（11）

就以首创“临时筹委会”形式的北京广播学院为例，该校在八、九月间斗争之激烈、对少数派政治迫害之严重，在北京高校当中都是突出的。

以下引述自《首都红卫兵》的一份调查报告。七月五日到二十四日，广播学院有一百多名同学、教员被打成“反革命”。七月二十四日撤销工作组后，保守派在工作组的幕后策划下，八月二十六日成立“革命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从九月初开始，搞了大规模的、长达四十多天的所谓“横扫”。他们说：“这次‘横扫’有问题的一个也跑不了”。党委组织部长聂丽兰、人保科长杨XX用大字报或口头公布一般干部档案材料，制造“逐步扩大，全面开花”的

舆论。无线电系教师文革主任、“代表大会”代表张X X说：“随着运动的发展，扫的面要逐步扩大。”院直部门科长级的干部七人，就有五人的档案材料被公布。“代表大会”还大量派人外出，调查一般教职工的材料。仅教务处，被调查材料的就有三十人，占总人数的一半。据统计，全院共有三百〇五人被调查和整理了材料。全院最典型的是无线电系。该系十五个少数派教师，全部被调查了材料，有十个人上了大字报。团支部书记以上的教师干部全部被扫。“代表大会”还对少数派监视、盯梢，制造流言蜚语，“使广播学院又一次出现了白色恐怖”，教师干部彼此不敢讲话，多数派群众不敢接近少数派群众，还发生了无线电系教师陈X X被逼跳楼自杀身死的事件。

调查报告还指控：“代表大会”统治期间“大刮劳改风，大肆抄家，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进行残酷打击”。“代表大会”期间，把干部份成四个劳改队：第一队：黑帮队——院级干部、总支书记、副书记。第二队：问题严重队——总支委员、基层干部。第三队：保皇派队——运动初期犯了一些错误的干部。第四队：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生活作风上有些小问题的一般教师和干部。后因群众抵制和反对，才撤销与第三队合并。“代表大会”期间，抄家成风，统统都是保字号组织出动，全院共抄家二十八户。甚至连本人的亲戚家也要被抄。“代表大会”、“思想兵”等多数派组织对一些被斗的教师实行强迫下跪、挂黑牌子、剃阴阳头，遭到了少数派组织“北京公社”的激烈反对。（12）

下面是北京航空学院的事态发展的情形。八月十日，北航四百多名同学前去中央文革，要求前工作组组长赵如璋回校检查。十一日晚，工作组回航院，北航红卫兵（北航的多数派组织）挽臂保驾，贴大标语“工作组是革命的”，并撕毁少数派贴的要求工作组、赵如璋作深刻检查的大标语。十四日，赵如璋终于上台作了十二分钟的检查，然后院文革急忙开始“斗黑帮”。“就在赵如璋的检查大会上，北航的文革制造所谓学生殴打工人事件。组织一些教师学生，招来一批家属、儿童，进行游行示威，‘抗议’‘反革命杀人犯’‘殴打工人’的罪行。还向八大院校工人、红卫兵求援、呼吁。于是地院、林学院、矿业学院在个别人的策划下，果然调集一些工人，敲锣打鼓，去北航示威表示‘支持’。甚至远在几十里之外的首都钢铁公司工人也被请来了。北航红卫兵又分乘汽车到国务院告状，并企图以航院全体工人名义发表《告全市工人书》（未得逞）。吵吵闹闹，闹得满城风雨，想一举摧垮少数派。”（13）

在北航和其他各个高校，总是少数派主张清算工作组，要求为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师生平反，而掌权或占优势的多数派，则急于斗争“黑帮”（即工作组期间就已被打倒的前领导人，和其他“反动权威”）；同样，也正是这些倾向于保工作组的临委、筹委和多数派红卫兵，大搞“极左”的人身迫害，大刮“劳改风”。以下是北航一位副系主任的回忆：

北航筹委会上台的第一道通令就是罚中层干部去挖游泳池，不准参加运动，每班还有“监工”，在大树下支着腿，一条一条记下，不是这个磨洋工，就那个“丑态百出”。有时，一些受蒙骗的群众去看笑话，小孩子也骂：“喂！你们这些黑家伙。”

九月中旬，在工作组和赤卫队的头头一手策划下，“中层干部管理小组”问世了，这些头头们训诫“管理小组”的人员说：“对干部就是要凶，要斗得越凶越好。”中层干部被管制起来后，白天劳动，晚上写材料。劳动前后都要训话、申斥、监督、登记；晚上集中在四系楼三层的一个大教室写材料。每人一个小课桌，互相隔开，不能靠拢；只许低头写材料，不许抬头，左顾右盼；不许交头接耳。就是上厕所也的先请假。材料交少了，说你消极怠工，写多了，说你推脱责任。每一次交卷总得挨几声骂。

中层干部想看一看大字报，也不允许。“管理小组”宣布，不准看“革”与“保”的斗争的大字报。有时想看看，脚未站稳，就会有一只手从背后伸来突然抓住你的肩膀，“戴草帽的？（因

为参加劳动)是不是中层干部?大字报不是给你们看的。”劳动完了,只好绕道回家,连大字报区也不能经过。(14)

下面再看北京矿业学院的情况。工作组临走时以张学文为首的校党委和工作组匆忙拼凑了御用组织筹委会和“首都红卫兵”,打击造反派组织“矿院红卫兵”,把大批中下层干部和群众打入“劳改队”实行专政,组织了临时党委,张学文以王任重之女王秀荣为桥梁,攀搭王任重,继续统治矿院。继续根据一九六六年初提出的“红线”与“黑线”(即以党委书记张学文为首的“正确”一方,和以院长陈一凡为首的教学行政干部为“错误”一方),把“黑线表”中的百分之九十的人打成“黑帮”。在院筹委会的组织下,组织了一个一百三十七人的“劳改队”,其中主要是主管教学的干部、基层干部和一般群众。劳改队里,剥夺参加运动的权利、剥夺人身自由,强迫每天写一次活动汇报,必须按规定的路线回家,中途不许东张西望,不准出校门,家里来往信件要上交。劳改中进行人身污辱:每天劳动一次点名、三次示众,劳改后低头听训话。有一次,“首都红卫兵”总部勒令全院所有“劳改”的干部,拿着脸盆前往中心区,低头听训话,每人登台敲三下脸盆,自报“黑帮分子X X X”,“反党分子X X X”并勒令挂牌,而且规定黑牌的尺寸,牌上要画上蛇,并注明“反党分子X X X”,“牛鬼蛇神X X X”。(15)

下面,来考察这期间发生在北京的两起著名事件,即清华“八·二四”事件和地质部事件。

1966年7月29日,北航附中红卫兵贴出“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并展开辩论。从此,文革的派别冲突又增加了某种社会阶级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的维度。清华“八·二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新发展动向的波及。有关“对联”和高干子弟红卫兵问题,笔者会在其他文章中专门论述,但本文下面不免涉及这个题目。

首先来看一位目击者的回忆:

1966年8月24日以刘涛等高干子弟为首的当时清华唯一的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与北京市老牌的中学红卫兵一起联合进行文革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所谓的“革命暴力行动”。那天下午,突然间用皮鞭、棍棒、口号和“语录歌”武装起来的大批红卫兵,以集团军的形式浩浩荡荡从校外开进清华园,以暴力冲击清华大字报区,用皮鞭驱散看大字报的群众,在对清华重要的大字报进行拍照之后撕光整个清华的所有的大字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广大师生员工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宏大的暴力斗争阵势,因此整个清华乃至整个北京高校区都笼罩着浓重的政治恐怖气氛。(16)

另据描述,当时“北京市几个主要中学的红卫兵齐集在清华附中,然后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带领下,大队人马杀向清华大学,把所有的狗崽子们的大字报都撕掉。这在当时也是影响非常大的事件。”“那天黑压压的自行车队集中在清华附中的大操场上,一色褪色军装,手提宽宽的军用铜头皮带,浩浩荡荡杀向大学。”(17)有关场面极具有高度凝聚性和象征性:对立的两边不仅是高校多数派、少数派,而且是“血统论”盛行的中学和不那么盛行的大学,享有特权和优越地位的高干子弟阶层和社会上其他一切阶层。

这个事件,可联系到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和二日北航附中红卫兵近千人到清华游行宣传“对联”作为预演,更直接联系到清华大学的“八九”派。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清华大学学生贺鹏飞、刘涛、刘菊芬(分别为贺龙、刘少奇、刘宁一的子女,前两人还是临筹委的负责人)等成立串联会,并于八月十九日组成“清华大学红卫兵”。“八九”派代表着典型的多数派观点,即积极斗黑帮但回避工作组问题。从各种纪录看,清华“八九”派在“八·二四”的暴力行动中,起了领导和组织的作用,特别是贺鹏飞的角色格外活跃。

以下摘自《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资料选编》，从中可以看出事件的来龙去脉：

六六年八月清华大学的革命造反派，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鼓舞下，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旗帜，彻底清算刘邓工作组迫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滔天罪恶。他们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拿起笔作刀枪，矛头直指刘少奇为首的黑司令部。在八月二十日以后的几天里，清华园内贴满了揭露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王光美之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行的大字报。

清华大学革命派的这一行动，在革命群众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十二，二十三日到清华看大字报的，每天都十万人左右。

但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为之心惊胆战，他们指挥他们的保皇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八·二四白色恐怖事件，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八月二十四日，以刘涛、贺鹏飞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调集了十二个学校的保字号红卫兵，撕去了矛头指向刘邓一伙狐群狗党的一切革命大字报。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刘涛、贺鹏飞同清华附中红卫兵一些人讨论了“行动”计划。叫嚷连什么水源，电源、广播台……都要“武装占领”。中午十二点赶制了专用的红卫兵符号，下午2：00十二个学校的保皇军集结在清华附中操场，贺鹏飞做了一番恶意的煽动，竟然污蔑揭露批判刘少奇这一革命行动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他们派人“占领”校广播台，控制了宣传机构。

下午4：00，所谓十二学校红卫兵一开进清华园，就立刻包围了大字报区，接着四处派人声嘶力竭地宣读了一份所谓“最后通牒”，什么“狗崽子放老实点”呀，什么“你们想把党的领导人一个一个搞臭”呀，陈词满书，不一而足。

他们企图用武力驱散看大字报的群众，扬言这些大字报不许看、不许抄、强行抢走革命群众的抄录本。有一个同学因抗议了他们这一暴行竟被他们拳打脚踢。

他们为了“秋后算帐”，对大字报进行了详尽的拍照，特别认真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以便对之进行迫害。拍照结束后下午六时许，撕去了揭露、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王光美之流的全部革命大字报。盖之以“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狗崽子不许翻天”、“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之类的叫骂口号。

事后，他们还在校园游行一周，向“狗崽子”示威。

晚上，他们非法抄了“第一红岩”等战斗组的家，理由即是因为他们揭露批判了刘少奇。  
(18)

另据记载：清华“八·二四”事件马上发展到其他学校。当日晚，北航红卫兵封锁大字报区，将矛头指向刘邓等人的大字报移走，制造恐怖气氛。北师大给刘少奇贴的大字报也统统被盖掉。“八·二四”事件后，清华少数派的处境极端艰苦，处在高压下，运动也转入冷冷清清的“斗黑帮”。(19)

“八·二四”事件即具有“官方”和“骚乱”两面性色彩，因为骚乱领袖贺鹏飞本人就担

任清华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校临时主席团主任委员和机械系“文革”主任。我们可以借助中外社会史上的一些规律性的现象来理解“八·二四”事件的意义，那就是保守势力出于对现存秩序动摇的恐惧、出于对“动乱”的反感，而进行“反客为主”的保守主义骚乱。这里，我们会想起1960年代在法国和希腊、1970年代在意大利出现的右翼青年团体和右翼恐怖主义组织的行为类型，想起美国南方白人保守势力的骚乱、私刑方式，尽管这里是略去了各自迥异的历史政治背景而言。（19a）

“八·二四”事件所揭示的另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就是：文革中对刘少奇的公开揭发，至少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就出现了，而且完全是群众自发的性质。今天，在各种主流文献中，都把十二月间“张春桥指使蒯大富组织游行示威”、“煽动打倒刘少奇”作为文革的一个最大的“罪恶”和“阴谋”。然而，清华“八·二四”事件及其缘起，被主流史学很策略地“遗忘”了，今天的人们，被剥夺了历史知情权，从而无法知道：文革运动中群众第一次对刘少奇的质疑和批判，是被拳脚棍棒和铜头皮带镇压在一片暴力恐怖之中！

如果说，清华“八·二四”事件是保守势力的主动出击，两周后的地质部事件是由造反派首先发难的一次集体行动。《大事记》记载事件的背景和大致过程是：八月二十三日，地院东方红公社派遣了一千多名战士步行到地质部，要求工作组组长邹家尤回地院听取意见、作检查，可是地质部党委拒不交出邹家尤，并煽动群众斗群众。东方红战士进行了静坐绝食斗争，结果迫使邹家尤答应第二天返校，听取批判。这就是有名的一进地质部。九月五日，一千多名东方红战士再次开进地质部，要揪回邹家尤听取批判，但邹家尤不肯。何长工说：“我死了，你们东方红要负责。”并说东方红“威胁首长安全”、“何长工休克了两次”、东方红“抢走了国家机密”等等。九月七日，他们调来了“宪兵队”——西纠，凶神恶煞地把东方红的队伍重重包围，以保护“老干部”为名，大打出手，撕衣服，揪头发，皮带抽，砖头砸，并抓去了八名东方红战士，进行毒打，关押二十小时之久。事件一直延续了十五天，“地院东方红于九月十九日暂时撤离地质部”。（20）

按照《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资料选编》的记载，西城纠察队和地院东方红的冲突不是从九月七日，而是从九月六日开始的：

九月六日早上，西纠队员云集地质部，封锁了主楼，利用何长工提供的广播室大骂造反派，把地院东方红战士层层包围，连上厕所都受到限制。

西纠一到，何长工等就一见如故，老混蛋说：“没有你们（西纠），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西纠分子则大骂“东方红”战士：“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们纠察队爷爷有权保卫国家机密，有权保卫‘老首长’，‘你们这些混蛋，狗崽子为什么无视‘红卫兵’，无视‘老首长’”。他们拳打脚踢，大打出手，气势汹汹，分兵把关，连何长工，邹家尤出入都有西纠分子“随驾”。

西纠后台许明（孔原老婆）怕露出马脚，急忙于第二天电告西纠撤退，第三天西纠灰溜溜溜走。（21）

地质部事件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一份调查报告做出这样的观察：“有些后来参加西纠的人，八月初还在对中学基层干部进行大规模武斗，但不过二十几天，在地院东方红小将开进地质部，要揪三反分子何长工时，这些人又高唱起‘保护老干部’的调子来了。”在和地院东方红发生冲突的西纠队员当中，就有邹家尤的女儿，这为“保爹保妈派”做出了具体形像的注脚。（22）

地质部事件后，地院校园内的斗争更趋激烈，特别是围绕舆论传播工具——学校广播台。《大事记》记载：“九月二十三日，地院东方红冲破地院文革的高压，奋起造反，查封了院文革办公室，夺院广播台。伪院文革保性大发，挑动工人赤卫队‘斗批改’兵团，大打出手，武斗整整持续了一天。一百七十名东方红战士负了伤，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同志即派观察员赶到地院，召开了全院师生大会，坚决支持东方红革命小将，肯定了他们揪邹家尤，炮轰何长工为首的地质部党委的革命行动。制止了这场武斗。中央文革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少数派’，大大鼓舞了其他院校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师生。第二天，北航红旗、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清华井冈山都采取革命行动，夺取广播台。”但大事记又说：“北航红旗经过艰苦斗争”直到十月四日，才“夺得了部份广播权。”（22a）

地质部事件表现出当时群众造反派集体行动的许多典型特点，也就是受压迫、受损害的阶层团体面对强大的精英和官方势力所经常采取的那些集体行动方式，其诉求通常是自卫性的（如果把进入政府机关静坐、要求领导人检查看成是“进攻性”的话，我们就要了解：领导人不检查，造反派就要继续戴着“右派”“反革命”的帽子，继续受迫害、抬不起头来），其手段是和平的但构成对官方正常秩序的骚扰，其策略是造成公共影响，引起公众的注意和同情。这些特点，也表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弱势群体和少数派团体的“公民不服从行动”中，如无耕地者、无家可归者的占领行动，种族隔离政策下受压迫种族的反隔离行动，以及各式各样的静坐、请愿活动。

和类似规模的群众集体行动类似，地质部事件不仅旷日持久地延续了两周，它所引发的爱憎和激情，足以使参加者全身心地认同它，把它当作史诗和里程碑，并以不断的重演作为纪念。《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发表、造反派取得舆论优势后，地院东方红曾于十月八日“三进地质部”，这次气氛似乎比较轻松，带着节日色彩：“地院‘东方红’小将带着乐队，开着宣传车，以毛主席象为前导，红旗招展，浩浩荡荡，三进地质部，他们在地质部大院召开了‘庆祝十六条发布两周年，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向何长工之流提出七项严正革命要求。深夜，东方红小将带着何长工之流凯旋而归。”十月二十七日地院东方红四进地质部，“扩大战果”。十月九日，李富春对地院东方红的代表保证：“你们可以在地质部设立联络站。地质部拨房子给你们。地质部办公，你们办公，地质部的牌子你们的牌子互不干扰。你们不要把地质部的牌子摘掉，地质部也不应把你们的牌子摘掉。”（23）这样，地院东方红这个从前受压的少数派群众组织，甚至被安排了一个从前被官僚科层所独占的“公共空间”，形成一种奇怪的、表面上的“双重政权”。

（未完待续）

~~~~~

## 【往事追忆】

### 红卫兵小报和我（十七）

• 周孜仁 •

（续上期）

留在重庆大学校内主持工作的，是勇者激情有余而智者柔韧不足的黄顺义。八一五所有人员心里都堵满了乾柴，星星之火就足以点燃燎原烈焰，而黄的失控理所当然成为了最早的火星。5月17日那天上午，他和同僚们异常紧张地一起守候在电话录音机旁，瞪大眼睛看着总团的女值班员将北京来电逐字逐句记录纸上。四周如此安静，只有磁带机嘶嘶旋转。当最后一句话记录完毕，中央文件终究没有出现任何关于“革联会”的字样，勤务员们顿时傻了眼。他们的



感觉肯定和那位砸派代表的感觉雷同：“怎么会是这样呢？”问题是，他们对于领袖毛、对于共产党、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崇拜，几个月来，已经那么根深蒂固地物化为了对革联会的崇拜。对于革联会的否定，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否定，对他们来说，都无疑于整个世界的颠覆。天崩地裂，大家不知所措了。马上召开总团会议传达辩论：吵得一团糟！接着在阶梯教室召开小组长会辩论：同样一团糟！下午，干脆在风雨球场召开全团大会辩论，情况更严重了。动力系四年级学生杨宪腾第一个跳上台，他的发言劈头盖脑第一句就是：

“给老子哪个搞起的！”

杨出身一个十分可疑的家庭。父亲在共产党接管大陆前夕跑了台湾，留下孤儿寡妇苦度日。按当时标准，算是标准的黑五类狗崽子了。可他活得十分性情，很轻松，文革中该造反他照样造反，该骂谁他照样骂谁。这种性格使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以“低姿态”为宗旨的《横眉》报的主编。毕业分配时，有人告他一状，说他骂过“林彪是奸臣”“江青是慈禧”而被弄来“学习班”和我们一起写交代。虽然当时我们都竭力帮他开脱，但内心里却对他的口无遮拦深信不疑。5月17日杨的演说火色一定很足，出格的话一定多多，这是肯定的了。接着柴天琪发言。前面说过，柴是学校专业辩论组的组长，他的演说想必更具煽动性。革联会是八一五的圣殿，圣殿倒了，大崩溃似的惶乱势不可免。大家认为100多人到北京工作，做了这么久的的工作，结果弄得中央还不了解真实情况：告状团的人首先就该打屁股。至于中央呢？一贯英明伟大的党中央为什么也糊涂如此？无线电系李姓学生曾怒而在六宿舍前写出标语：“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意见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进军号”，算是极而言之了。最后，留下唯一的、天真烂漫的悬念就是：这五条毛看没有看？林看没有看？重大八一五在当天发表了一个“对当前时局的严正声明”，反映了当时的集体惶恐与迷乱。“声明”继续自以为是地宣布“重大815战斗团始终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继续毫无意义地为不复存在的革联会招魂，同样自以为是地宣称它“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产物，是“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是山城数百万革命造反派同志浴血奋战的结晶。”“声明”发誓要“坚决支持革联会，誓死捍卫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一月革命万岁！革联会的革命精神万岁！”“声明”还怒气冲冲地警告：“山城砸派从二月黑风以来，就一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你们必须改弦更张，悬崖勒马……否则，坚持下去，就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矛盾就会转化。”最后，他们高呼“革联会必胜！砸派必败！”

陡然降临的绝望使八一五丧失了起码的政治理性，洋洋洒洒数千字，通篇竟然没有半个关于中央“五条”和拥护“五条”的字样。这个严正声刊登与5月19日出版的《815战报》第二十一期。

与此相反，5月17日成了砸派的节日。他们同样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反正“伪革联”没有了，他们就算大获全胜，于是大游行，于是喜洋洋，满街都是他们欢呼五条的标语，满街都是庆祝“伪革联寿终正寝”的口号，文化宫的大门前扎起了两座纸做的“伪革联之墓”，倒吊着纸扎的象征革联会的“癞格宝”，不少顽童还用竹竿吊着真正的癞蛤蟆满街欢跑。

砸派的欢呼极大刺激了八一五脆弱的神经，于是轻而易举地落入了敌手的圈套。五月十八日，八一五派迷迷瞪瞪地举行一个更大规模的反击示威：“誓死捍卫革联会”。好像国破家亡，要复仇，要救亡了。整个气氛极其悲壮，极其严峻。重大八一五队伍自然最引人注目，走在最前边的是一群体工队员，人高马大，个个手握军用皮带，杀气腾腾地簇拥着一道革联会的金字招牌，上面还扎着红绸，接下来是巨幅标语：“强烈要求张国华、梁兴初到重庆答疑！”整个游行队伍中仍无一条关于拥护中央五条的标语，反之，革联精神万岁之声震天动地：对中央的不满分明写在每一张杀气腾腾的脸上。

一贯以大方向正确自居的八一五气还没出完，神还没有缓过，砸派的大标语已经铺天盖地

而来：重大815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坚决揪出重大八一五炮打中央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

54军肯定是急了。十分明显，重大八一五一旦滑坡，整个重庆的局势将不堪设想。5月20日，驻军副政委蓝亦农、副军长白斌、韩怀志、参谋长耿志刚一行人等，火速前往重大发表演讲，稳定大学生情绪。虽然中央文件刚刚批评了他们支一派、压一派，可大会上，驻军代表还是公开接受了重大815的袖章，并表示“能作为一个815战士，我感到很光荣。”并明确宣布，他们是来“向同学们学习，趁这个机会给同志们作个汇报”的（白斌语）。军人的态度如此真诚谦恭，学生们还有什么好说呢？于是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呼“重大八一五永远忠于毛主席！”高呼“向解放军学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上任伊始的革筹组长蓝亦农在讲话中首先对中央文件经“毛主席批了的、林副主席看了的”这个真实性作了确认。他说：“八一五总团的同志……要我们打包票，我们所有的军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的，一致打包票。”接着像幼儿园阿姨那样给大家讲了一个津津有味的故事，说54军参加1962年的中印之战，大胜对方，缴获枪械无数，他们在5000多米的喜马拉雅山上把敌人散落的武器收起来，擦好——上级却通知他们把这些战利品全数交还对方。“指挥部的同志有的哭，有的气……当时想不通，我是作政治工作的，很发愁。这时马上来了一个电报，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作政治工作的就很高兴了，就把这句话传下去，全体指战员没说二话。大家议论这是为什么？说不出道理，只晓得毛主席说的就是对的。”这个故事顿时赢得满堂彩。他还在演讲中明确宣布：“（军队）过去坚决支持你们，今后坚决支持你们、相信你们！（记录稿此处注明：全场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今后“如果不依靠你们，不相信你们，（我）就是光杆司令”。对已经笑逐颜开的大学生，他又面授机宜，说：“看问题要看得远，看一千里，革联会是临时的，过渡到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是更上一层楼”——这句话后来演化成了八一五派有名的口号：“革联会开新宇，革筹组更上一层楼”。

接下来，白斌副军长的演说更从感情上对学生们进行了煽动。参加过当时会议的人，至今还记得白讲的一件事，说三中抗大兵团给54军军部打来电话，“他们一面打电话一面哭，心情很沉痛，说希望我们给重大八一五作一些工作。重大八一五是重庆八一五的旗手，这个红旗不能倒。说我们三中抗大兵团看着他们。我们思想上也想不通，但五条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我们就要坚决照办（记录稿此处注明：全场高呼向三中抗大兵团小将学习！毛主席万岁！）。……这是中学生将了大学生的军，这个军将得好！三娘教子，子教三娘，为什么中学生不能教育大学生呢？完全可以。（记录稿此处注明：全场高呼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是不是大学生更书卷气呢？相比之下，八一五的中学生们确实更懂得实惠，下面这句有名的口号也出自于当时的中学生：“方糖也甜，圆糖也甜，砸派有个铲铲权”（笔者注：铲铲为四川俚语，空空如也之意）。

几十年后，重读这些演说和激荡满场的口号，必须承认，中国军人确实不愧为政治工作的典范、一流的煽动家。当然，当时的大学生，思想水准和娃娃差不多，两者一结合，效果自然很快显现出来。就在这一天，重大八一五发表了“再次严正声明”。除了继续重申“重大815战斗团始终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革联会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产物，是‘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是山城数百万革命造反派同志浴血奋战的结晶。”除了抽象地继续表示要誓死捍卫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继续高呼一月革命万岁、革联会的革命精神万岁之外，已经不再具体地要誓死捍卫什么，这些条文的位置也在声明中往后挪了。第一条是：对中央五条“最最坚决拥护”“最最坚决执行”；第二条是坚决拥护由蓝、白、唐等人组成的市革筹组的正确领导。从“严正声明”到“再次严正声明”，时间间隔不过前后三天：这个弯子实在也转得太急了，不免有点羞羞答答，言不由衷。“再次严正声明。”不像两天前的“严正声明。”那样气壮如牛，放在一版的显著位置，而放到了四版的尾巴上。第一版刊登的是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7〕159号，即“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五条原文，接着是一个号召学习的通知，为了

淡化五条，在号召学习“红五条”的前面还故意加上了号召学习“五一六通知”的内容。要大家明白：“毛主席是舵手，八一五跟着走，毛主席说了算，八一五照着办。”工科学生就是工科学生，政治家们应有的厚脸皮，他们半点没有。以上这些，都发表在姗姗来迟的5月26日出版的《815战报》第二十二期上。

21日，八一五派在大田湾召开大会，与会人数号称25万。会议主题是：“坚决拥护中央五条”、“革筹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是山城八一五派英勇奋斗的胜利。革联会好，革筹小组更好。”革筹组长白斌到会讲话。大会通过给毛泽东的致敬电。

热热闹闹折腾了几个月，这一个回合算是尘埃落定了。“中央五条”，从而革筹组的存在，已经无可置疑：这使两派都面临了新的、巨大的难题。大凡执着于宗教信仰的人，当厄运骤至，他们要么处变不惊，从容应对；要么果敢拒绝，以死相争。815和砸派都是些信仰坚定的人，他们对信仰的执着不亚于任何狂热的宗教徒。问题是，他们的上帝和远在虚空的上帝不一样。天堂里的上帝因为他的虚无而让信徒有可能按自己的观点去任意诠释，从而实现心灵上的安慰；真实存在的上帝就不一样了。他健在，身体还非常健康，他随时都要亲自发表“最高指示”，这些指示变化莫测，甚至自相矛盾，让你既不能从容，更不敢拒绝，剩下的，就只能是尴尬和无奈。骄矜自负的八一五这边，原来，他们所感知的砸派，就是颇似小丑的徐光明、和他那个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红岩公社》，而如今，在他们必须遵循的红头文件里，砸派突然间成了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一大派，他们必须学会与之平等生活。再说砸派（后来很快更名为反到底派），他们和成都的川大八二六一样坐过牢，在云诡波谲的政治搏奕中做过太大的风险投资，他们应该得到巨额回报了。川大八二六原来不就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一个小小支队吗？而现在一转眼却成了把红成压得喘不过气的政治主流。西师八三一呢？相比之下，他们收获的利润就太可怜了，充其量就平了个反，让他们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依旧两手空空，依旧什么实权没有。枪杆子还在八一五一边。他们依旧生活在枪杆子的阴影之下。

（未完待续）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